

张承志文集 XI

# 敬重与惜别

——致日本

张承志 ◇ 著



文艺出版社

张承志文集 XI

敬重与惜别  
——致日本

张承志 ◇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  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敬重与惜别:致日本/张承志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5.4  
(张承志文集)

ISBN 978-7-5321-5673-3

I. ①敬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4355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策划统筹: 曹元勇

责任编辑: 曹元勇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敬重与惜别

——致日本

张承志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山东省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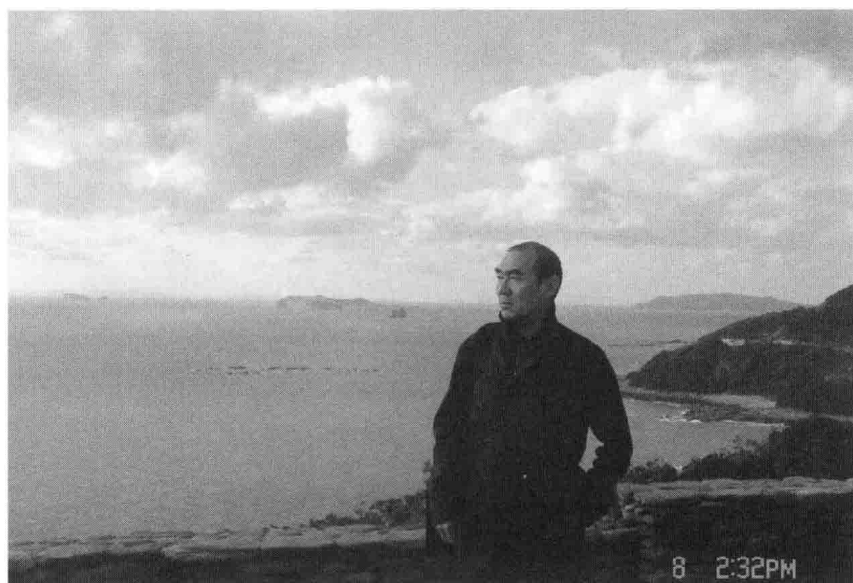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20 插页 3 字数 232,000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673-3/I · 4519 定价: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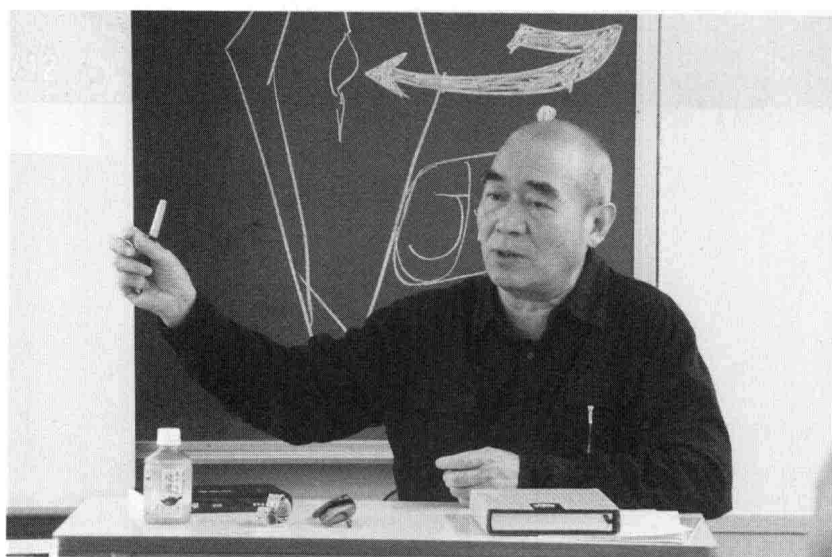
T: 0539-2925888



2006 年 - 在日本



2006 年 - 在日本 - 拿着冈林信康的琴



2013 年 - 在日本中央大学讲演

# 目 录

## 敬重与惜别

——致日本

- 第一章 引子：东苏木以东 / 3
- 第二章 三笠公园 / 21
- 第三章 长崎笔记 / 53
- 第四章 赤军的女儿 / 107
- 第五章 四十七士 / 154
- 第六章 解说·信康 / 178
- 第七章 文学的“惜别” / 205
- 第八章 亚细亚的“主义” / 243
- 第九章 终章：把解剖之刃对向自己 / 283
- 跋 / 296

## 附录

张承志文学创作大事记 / 301

## 杀青若汗颜

——《张承志文集》编后记 / 311

# 敬重与惜别

——致日本

《敬重与惜别——致日本》单行本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2009年1月初版;修订版由九州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,同时由作者自译日文版定稿。本卷收录的是作者最后修订稿。

本卷中部分日本人名、地名等专有名词,作者采用了日文当用汉字。特此说明,文中不再一一注明。



## 第一章

### 引子：东苏木以东

这一篇文章，究竟怎样开头呢？

百思不得其案。后来想到一个人，我想，没准那白发老头的故事，可以简单地说明这种复杂性？所以，我用这一篇做个引子。

—

初遇服部幸雄，是在一个读书会上。

如今回忆着，那回讲演的组织者确是茉莉会。那个会名，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。讲罢时记得有鼓掌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。我虽然眉飞色舞，其实心情黯淡。曲终人散，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。那种讲演，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，于我虽是熟练惯技，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——草原、我、日本，这三者之间，太不协调了。

讲台下一，一个白发的老头走近来，递给我一张名片。

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时候,全然没想到会与他发生一段友谊,更不能想象会因他激起写作的冲动。他走过来,对我说的话是:

“您讲演时总说到:在东乌珠穆沁的东部,有一个新苏木。我怎么记得有噶黑勒苏木,有农乃苏木……而没有新苏木呢?”

显然这是个熟悉东乌旗的人,但在日本这并不新鲜。我急着想回家,不想花费口舌。我哦哦着,敷衍着他唠叨的一串地名。但是他接着说出的下一句,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脚:

“我和你,在东乌珠穆沁,在同一个地方,送走了青春!……”

他的那个“东”字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蒙语说的,jū,说得特别清楚。这有点像我,总喜欢强调我们是在“东部的”乌珠穆沁插队,生怕别人误认我们是 barān hušuu(西部诸旗)的二等草原沙窝子出身。说实在的,最开始我怀着的是一丝嘲讽。虽然我意识到这个人与东乌旗有着纠葛。

我端详着他,问道:“您在东乌珠穆沁住过?在哪里?”

“在你说的最东边的苏木以东,你知道农乃苏木吗?”

“当然知道。您说的农乃苏木,离我所在的新苏木,只有一百二十里,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……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,我骑马去过那儿一次,但是它已经叫做……”

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头的第一次谈话。

他满嘴的苏木,就是蒙语的“庙”(sumu)。他会说一点蒙语,尤其喜欢反复地用蒙语说东乌旗的一些地名。我也喜欢这样。那天有点像比赛谁说出的蒙古地名多,而不是要交流青春。我恍惚听他自我介绍是当年的关东军,就住在我们公社以东的、过去叫农乃庙的乌拉盖牧场。

当然，关东军听不懂公社化以后的地名，而知识青年也不熟悉寺庙的事。幸好我当年对什么都感兴趣，多少还知道几座喇嘛庙，否则在日本还真没办法和“下乡”的关东军对话！

服部的话题其实并不多。聊起来，有时不知他是陶醉于蒙语，还是暗中回避询问。接触多了，甚至我觉得他是个封闭很深的人。不过是因为我讲话中提及的地名离他的记忆太近了——这使他兴奋。至于这兴奋本身究竟是什么，它导致什么结论和思想，他不清楚也不在意。好像，他也找不着词儿，所以酸溜溜地只是唠叨“送走了青春”。

您是日本关东军，我是北京新牧民，咱俩能算有共同青春吗？顶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点而已！……我暗自揶揄。那时人在花之东京，那里无奇不有。应酬一番之后，我便忘掉了他，不管他怎么在农乃庙吃过奶豆腐。

## 二

好像接到过一两个明信片，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。回国后有一两年，偶尔感到他似乎在寻找我。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，我不仅顾不上回复，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。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，互相已经说了一阵子，但我其实并没想起这个“服部”是谁。

不过，再次见面后“东”乌珠穆沁的话题，又使我们热闹起来。

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，语气短促，滔滔说着。一头银发散乱，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。他不在意地说：“他们总想让我讲过去的事，我不答应。”边说着，他一边靠向我：

“他们怎么会理解呢？”

那口气给人一种暗示或误解。他好像在说：理解他的，唯有也在“东乌珠穆沁”打发过青春的我。不能说没有一点感动。很难总是敷衍，我开始想了解他了。“您那时，名义上是关东军……”

“关东军情报员。”他正式地说。这个词，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畅谈了若干次，我也没有完全弄懂。什么什么“员”，就像“研究员”一样，并不标明阶级学衔，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。

“那么在乌珠穆沁，具体地说，您那时干什么呢？”

“那边是外蒙古，嘿，苏联军。我们趴着，嘿。”

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。观察哨？把守国境？……我再追问时，话头已经移开了。“哈，霍洛特，好吃吧？哈哈，好捏，吃过吧。”

霍洛特(horod)是奶豆腐，好捏(honi)是羊。“当然吃过。”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。但我觉得他倒不像闪烁其词，而不过是要享受说着这些词儿的滋味。

对他做出这一心理判断，费了我很长时间。是这么回事么？一些古旧的词儿堵在心里，要找个地方，用嘴巴说它一说。说的时候需要一个听众——或者说，是需要一种确认；所以，同在一地、同在“东”乌珠穆沁的“东边”住过的我，就成了必需的存在。

他凡来中国必要会我。每次都一样，说一阵子东乌珠穆沁，再说一些别的。我和他的交流断断续续，更因他的这种习惯，一次次的话头接不上茬。

我渐渐漫不经心，虽然现在不禁后悔。每次挥手告别后，我就忙自己的事，而把他忘却净尽了——直至他再来到中国，又一次拨响我的电话。

那一年在北京，三里河的宴宾楼，还没堕落为啃得鸡。我俩在饭馆吃着，话题全在蒙古。

我给他夹菜：“这是烧羊肉。”他看着夹在筷子上的肉，古怪地一笑。似乎关东军情报员接受了一个信号。“羊肉！……嘿嘿，马哈以德（吃肉）……好捏乃马哈（羊肉）。 ”

他享受着被唤醒了两个蒙语词儿。其实，他的乌珠穆沁记忆，只有很少的一些细节。我开始询问他屡来中国的目的。

没想到——老头子把一条腿垫坐在椅子上，毫不在意喧闹的餐厅，接着羊肉的开头，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一匹狼般独往独来、在青海境内逐村支教、扶贫助穷的个人行动。他显然并不自觉了不起，好像这些事只是在与我谈论东乌珠穆沁之外的小事末节。我有些头晕，原关东军分子在中国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——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令我吃惊。

“教育可是重要的！……”他晃着大脑袋，严肃地对我说教。

“那您怎么具体做呢？是办了所学校，还是……”

但是这老头的自语症又来了。三里河夜间的街道上，寒风掀动他飘飘的一头银发。他解释般笑道：“我讨厌帽子！”我发觉，老头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。我打算认真和他做忘年交了，也对他自我开张的事业开始感兴趣。但是我了解他的梗概，还要等到下一次。

### 三

他依然住在民院家属院对门的政协宾馆。我坐定以后，见满桌满沙发都是表格和本子。随手一翻，到处都密麻麻写着学生姓名、年龄、民族、家庭人口、收入、申请的奖学金数额。

有些不是个人、而是学校的申请。我拿起一份，读着很有意思——因公路通过校舍，若顺校舍一侧沿路盖房十间，可建一座餐厅

或加油站,经营所得款项可补助教育经费若干若干,现申请兴建此十间房屋所需补助伍万元。附着公路和校舍的地图,以及计划中的新屋位置。

更多的是报表。学校把申请服部老头援助的学生名单造册,马保国、卓玛草、扎西、黑麦、乙卜拉、李三小——密麻麻地一行行排列在名簿上。每一行是一个小孩:姓名、年龄、民族、村子、家庭经济状况、申请的补助金数额——我喜欢那些栩栩如生的活泼名字,从那数不清的一份份有趣名单上,一座座藏回汉杂居的村庄,声色气味跃然纸上。

我翻阅着,心情复杂。服部老头在中国教育扶贫的钱,是他自己在东京的两处公司(一处医疗器械商店和一处和服衣料店)经营的赢利。他把挣来的钱收集到手,然后就直奔中国。

几年后他选定了青海为目的地。

我问他为什么没选内蒙古或乌珠穆沁——话一出口,自己先感到了不必要。大概就像我感觉到的一样,东乌珠穆沁太富裕了!富裕使它也许不在意一捧一抔的心意,富裕也会使人对学习轻慢。我猜,服部还是觉得青海农村对教育更热爱,何况——

“青海也有蒙古人!……”他高兴地对我嚷,“也有你们回族。……”

“有一个村子两个民族打架,我去劝他们。嘿,我站在中间,我不怕。人呀,对方哪怕是……唉,有蒙古,奇伯特,回,嘿嘿。”

一对回藏村庄靠着公路,两个村子的孩子都顺着公路、和风驰电掣的卡车挤着上学。为了安全,服部给娃娃们买了一台拖拉机。但他有意只买一台。“若是买了两台拖拉机,肯定是回藏孩子们各乘一台,反而不团结。”一台车,就是要让孩子们习惯挤在一块。

他的话题是高速转移的:

“听说过文艺座么？”

我不自信地说：“知道一点。俳優座什么座的，像是剧团，左翼的？”

他满意我什么都知道一点。

“对呀。就是那个。我的以前的妻子，嘿嘿，是文艺座的。是女演员。所以他们说，我是受了老婆的影响，哼！”

我问“他们”是谁，但一瞬间他似乎只忆着那位女性。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脱口而出：“今天的日本右翼，没思想！……”

我追问：“您是说，那时候的右翼有思想么？”

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，提到了川岛浪速。由于这名字和另一个恶名远扬的人名列在一块，使我刹那间对老头顿生怀疑。

他慢悠悠地说：“我曾经在川岛先生家住过半年……”

他那川岛先生的满洲养女，是名声刺耳的川岛芳子。在我读过的资料中，那女人疯狂病态，是日本侵略的帮凶。

老头会心地一笑：“在中国，她名声不好对吧？嘿嘿。”

我还是感到了隔膜。想着读过的川岛芳子，我甚至感觉严峻。您还和川岛芳子有共同青春地点呢！我心里想。

但那时的我，已见识过日本式的“左右混淆”。川岛浪速和他的同时代人，都并非一些疯子狂人，而一个比一个复杂。

“在川岛家做什么？扫地干杂活吗？”

“不！——在各方面，受到教诲。”

他说这一句时表情的庄重，至今使我难以忘怀。一瞬间，在沙发上他仿佛摆出了当时的姿势，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视。

他描绘的川岛家，使我好像瞥见了一幅古旧的门客图。我笑着，但怀着一丝不易解释的紧张：

“后来您就当了关东军?”

“不,我不是军人。民间人……总之叫做关东军情报员。”

“也穿关东军的衣服?”

“不穿军服。”

不知为什么,这最后一句使我大大松了一口气。我猜测着,一一询问,但他对我问及的诸如大陆浪人、右翼团体等等,无不连连摇头。我发觉,界定或判断他的年轻时代是困难的。何况又有一位文艺座的左翼女演员,模糊的形象使我浮想联翩。

“那位夫人,文艺座女優,后来呢?”

他眼睛里掠过一丝难测的神色:

“我太任性,让她吃苦啦,嘿嘿。……阿拉伯的劳伦斯,知道吧?”

我琢磨着,不得要领。显然,我那时的日本知识,涵盖不住这复杂的老头。我只是听了些概念。但用概念的套子,是很难套住这不驯老头的。

就这样,他一直也没给我讲清——五十年前,他怎么进了右翼大陆浪人的门槛,怎么娶了左翼女演员当妻子,怎样到了乌珠穆沁的东部,怎么给关东军当了民兵;就像他也一直没让我听懂——五十年后他怎么去了青海,怎么进了那些贫瘠小村,怎么给各族儿童分发助学金。

反正,“蒙古劳伦斯”已经变成了乡村教育家。左和右剧烈地混淆,彼此尖锐地分解又化合。我意识到:不管标签怎么剧烈变换,但那颗银发飘飘的大脑袋里,有一个什么丝毫未变。听他的口气,他不过慢悠悠接着走着那条东乌珠穆沁开始的老路。他不屑与众人共语,因为“他们没思想”。

没错,老头子丝毫没变。这颗白发覆盖的脑袋里,深藏着一条对



中国人很陌生的思路。更有趣的是，他武断地判定我与众不同，这使我暗暗叫苦。随着交往愈多，我愈加说不清了。年轻人不行、新右派不行——难道我反而算懂得他，只因我也在“东乌珠穆沁之东”住过、吃过奶豆腐和“送走过青春”？

宾馆房间里，乱堆乱撒着申请表和助学金发放名簿。马占海、尕才让、法土麦、王小红。我不是好奇，也许是有些难受地翻阅着那些名簿。

他骤然切入的，是我熟悉的世界，宛似另一个东乌珠穆沁。如果我不是对这些名簿上的小孩和他们的父母过于熟悉，如果我不是至今还和他们的父母站在一块无形的地场上，风刀霜剑，心甘情愿，我依然会忘掉遥远的服部老头。

但是现在不能了，我不能回避他加于我的反省。

因为他做着的一件一件，都是我正在努力做的。只是他干得更随意，更富于行动的果决。

“嘿嘿，不用看……没有用，嘿嘿。”

见我翻看那些名簿，他的表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仿佛他认定自己的事，就是按名单发钱。现在钱已发罢，他已经休息。

他随手把一叠名簿扔在茶几上。“一个村子的小孩，家里都很贫穷，给谁又不给谁呢！”他自语般说。我又摸起一本，满本的一页页上，申请的助学金数额，都写着 50 或者 80。望着那些法土麦和卓玛草，我茫然无语。

“去年您怎么没有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店里不景气，钱不够。”他望着我。好像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坏处，只是妨碍了他去青海。“今年，我朝姐姐借了一百万日元，说以后